

试论新保守派与基督教右翼的联盟 及其主导下的美国中东战略

徐薇薇, 胡祥云

(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政治系, 北京 100091)

[摘要] 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自由主义泛滥及其恶果激发了新保守派与基督教右翼的崛起。作为分别活跃于上层建筑领域和社会政治基层的两个新兴集团,新保守派与基督教右翼在共同目标的驱使下,通过竞相加入共和党阵营和建立全国性基督教右翼组织,实现了强有力的结盟。这一联盟支持共和党夺回了美国政坛的优势地位,并决定了美国社会近30年的整体保守趋势。新保守派与基督教右翼在外交立场上高度投契与一致,在两者联盟的主导下,布什政府针对中东伊斯兰世界推行了“自由、民主”神圣诉求下的反恐战争、铲除暴政和文明改造战略。但这一战略至今已使美国陷入日益严重而又难以摆脱的困境之中。

[关键词] 新保守派; 基督教右翼; 联盟; 中东战略

[中图分类号] D7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06)06-0004-09

国内外学界近年来对美国新保守派多有论述,因为它支配着布什政府的政治理念与政策构建。同样,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了美国基督教右翼并加以研究,因为它是决定近两届总统大选共和党获胜和连续执政的主要选民基础。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对于这两股左右近年美国政治走向的力量缺少关联性的综合研究。本文试在对新保守派和基督教右翼的缘起做一定探讨的基础之上,解析两者结盟的原因、途径及其对美国政治走向的影响,揭示这一联盟在外交理念上的深刻契合和在其主导下布什政府中东战略的“神圣”内涵与走向失败的必然。

一、新保守派与基督教右翼的缘起

罗斯福“新政”后,自由主义逐渐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思想,20世纪60年代,自由派的影响达

到巅峰。但物极必反,美国社会一场新的深刻变化正在酝酿之中。

(一)自由主义阵营裂变——新保守派异军突起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民主党政府旨在“向贫困开战”的“伟大社会”计划失败,凯恩斯主义使美国经济陷入“滞胀危机”,与此同时,自由主义在社会生活领域极度泛滥,性解放、嬉皮士等“反传统文化”大行其道,毒品、家庭解体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传统道德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逐渐瓦解,支撑美国社会大厦的基础出现了动摇”。^{[1] (P.64)} 面对此景,一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对盛行的自由主义产生了怀疑。他们意识到,“正是自由主义迷失了方向,政治灾难才接踵而至”。^{[2] (P.36)} 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些知识分子与日益极端化的自由主义决裂转向保守,但其主张与传统保守派有所不同,被称为

“新保守派”。

新保守派通过撰写文章、制造舆论等方式宣传自己的主张。新保守主义“教父”欧文·克里斯托尔与诺曼·波多雷兹在60年代所分别创办的《公共利益》与《评论》成为新保守派发表政见的主要平台。欧文·克里斯托尔认为，新保守主义“既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又是传统保守主义的发展”。^{[3] (P.12)}内政上，新保守主义坚持自由主义的市场机制，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同时，它发展了传统保守主义对权威和秩序的强调，十分注重道德、宗教和精神的價值。外交上，新保守主义糅合、更新了传统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点，强烈主张积极的全球政策；认为美国的根本利益在于输出意识形态，信奉单边主义，认为“权力是扩张道德的工具”；主张依靠实力向全世界推广美式民主，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4] (P.230-235)}

新保守派骨干成员大都是东欧犹太移民的后裔，基于“旧大陆”反犹主义带来的苦难和“新大陆”自由民主制度带来的福祉，这些犹太精英坚定地认同美国特有的“山巅之城”、“天赋使命”的优越感和使命感，并注入其植根于犹太教传统的救世主义热情。^[5]可以说，在60年代美国自由主义走向极端，道德、文化紊乱之际，新保守派挺身而出承担起为美国“护法”的使命，也是一种符合犹太人历史体验的选择。

社会剧变所引起的反应不止于新保守派，极端自由主义的蔓延还激发了其更广泛的直接对立面——宗教保守派，即基督教右翼的兴起。

（二）对反传统文化的回应——基督教右翼的反击

美国是“有着世俗政府的基督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6]美利坚民族主义实质是世俗化的宗教民族主义。2003年民调显示，92%的美国人信仰上帝，57%~65%的美国人认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非常重要。^{[7] (P.69)}

肯尼思·沃尔德认为，“基督教右翼”代表着新教福音派在政治上的出现。“福音派”更多是指一种宗教风格或倾向，它信奉圣经的绝对权威，将“在

人世间传播福音”看作是最重要的义务和责任。把基督教右翼说成是福音派政治上的表述，并不意味着只有福音派支持基督教右翼，其追随者还包括非福音派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一些非教徒中的保守人士。^{[8] (P.136)}基督教右翼不仅在神学上笃信正统，而且在社会观念上坚持保守，它既是一种思潮，也是一种社会政治运动；它既是一个群体，也是这个群体在政治问题和社会事务中的表现。^{[9] (P.122)}

截至2003年，新教福音派信徒的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人口的30%，而囊括了多种保守势力的基督教右翼，其规模更远大于福音派。国内问题上，基督教右翼反对堕胎和同性恋合法化，主张公立学校公开祈祷等；国际问题上，他们相信美国是上帝拣选的“神圣国家”，信奉美利坚民族的单边主义，鼓吹“凭借实力获得和平”，强烈反共、反对无神论；认为以色列国是《圣经》预言的体现，主张全力支持以色列。^{[1] (P.91-94)}不难看出，基督教右翼与新保守派在宗教倾向、社会主张、政治立场和外交理念等方面相当接近，以至彼此认同。

20世纪70年代以前，基督教保守信徒多将精力集中于教会和福音传教，很少关注社会改革。然而，60年代以来的反传统浪潮所引发的社会危机，给福音传道使命带来了特别的紧迫性与危机感。他们发现“最高法院的大多数决议明显背弃了基督教的道德教义，堕胎合法化、禁止在校园内集体祈祷、权利平等修正案无不是对宗教和传统家庭的伤害……上帝国与撒旦国之间分明的界限开始模糊起来”。^{[10] (P.129)}为了捍卫基督教道德，他们以反击者的姿态，针对堕胎和同性恋等社会议题展开了攻势。他们从基层教会出发，建立了数以百计的团体，并借助现代传媒，扩大了政治影响。但是这些团体分散于各地且缺乏协调，其影响力还不足以改变社会氛围。基督教右翼意识到，只有将声音渗透到政治决策层面才能使自己的呼声传达更为有效。

然而问题是，美国宪法的“政教分离”原则在维护宗教自由的同时，也限制了宗教团体直接参与政治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基督教右翼必须通过世俗的

“政治代言人”来实现其社会诉求。

二、新保守派与基督教右翼的政治结盟及其强大作用

在美国政党轮替的民主制度中,强大的利益集团总是两党竞相争取的对象,这无疑为信众基础日益庞大的基督教右翼提供了政治崛起的可能。

(一) 共和党——两者结盟的政治依托

20世纪70年代,冷战呈现“苏攻美守”态势,而水门事件后上台的卡特政府推行温和的人权外交,并倾向社会自由化潮流。新保守派深感民主党已不能为他们代言,其大多数决定离开民主党,加入共和党,并与共和党内的传统保守派基本上达成了外交共识,认为美国的当务之急是要夺回国际战略优势和道义高地。传统保守派与新保守派暂时的一致为后者进入共和党决策圈提供了便利。欧文·克里斯托尔直言,“新保守主义更像一种说服力,它在总体上把具有不同愿望的共和党人和保守主义者转向一种新的保守主义政纲,以适合在现代民主条件进行统治”。^{[11] (P.14)}

基督教右翼同样等到了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历史上,大多数福音派都倾向民主党,因为他们所生活的南方地区自美国内战以来就一直认同民主党,而且“新政”帮助他们实现了经济复兴。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民主党支持堕胎、同性恋权益等自由化立场,正是“觉醒的”福音派所极力反对的;另外,南方的经济发展在原本相对贫穷的福音派中造就了一批中产阶级,对他们而言,民主党的累进税和福利政策已经变成负担。虽然他们在1976年仍支持浸礼会教徒卡特当选总统,但卡特上任后“背叛”了福音派的事业,终于使福音派与民主党决裂。^[12]福音派脱离民主党的趋势引起共和党的高度关注。水门事件使得共和党失去大量选民支持,该党的国会席位于1974年降至最低点。逆境中的共和党将目光投向福音派和以其为主干的更大选民团体——基督教右翼。共和党人急剧调整党纲使之更趋“积极的保守”,并开始广泛接触认同共和党纲领的基督教

右翼领袖。后者抓住了这个政治崛起的有利机会。

新保守派和基督教右翼出于相同或相近的目标,竞相加入共和党阵营,这无疑为两者的结盟提供了可靠、有效的政治依托。

(二) 基督教右翼全国阵线——两者结盟的组织手段

鼓励并协助基督教右翼建立其全国性的统一阵线,是新保守派与之结盟并发挥其政治能量的组织手段。当时奔走于基督教右翼和共和党之间的是一个以新保守派为主的活动小组。1979年春,在这个小组的牵头下,一批共和党议员拜会了福音派主要团体之一、全国最大的浸礼派教会的领导人——杰里·福韦尔,商谈利用该派庞大教众基础建立一个全国性组织,来为共和党次年的总统竞选助阵——“道德多数派”随即成立。该组织不久便号称在美国47个州设有分部。^[12]另外,在新保守派的支持下,美国南部建立了“宗教圆桌会议”,为宗教保守派中针对不同议题的团体提供了一个大联合的平台。^{[13] (P.111)}这些全国性组织一经问世,即被看成是拯救基督教传统、扭转社会堕落趋势的希望,受到了广大保守群众的支持。1980年的盖洛普民调显示,3000万美国人自称为“重生”的福音信徒,另外有2000万人表示赞同或支持福音派。^{[7] (P.242)}

如福韦尔所言,建立基督教右翼组织是要“让基督教右翼进入美国政治生活;使他们加入共和党;把保守人士选进政府”。^{[14] (P.72)}通过这些全国性组织的创立,“共和党获得了牢固的选民基础”,^[12]基督教右翼找到了影响政治的途径。而新保守派与基督教右翼则在共和党内实现了“结盟”,这一联盟最重要的含义是,参与决策的新保守派可以借助基督教右翼广布全国的“草根性”基层组织来赢得党内的主导,而处于社会政治基层的基督教右翼也正需要新保守派这样投契的“政治代言人”。

(三) 从里根到布什——新保守派与基督教右翼共同打造的右倾趋势

两届里根政府(1980~1988年)是基督教右翼和新保守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高峰。1980年,“再生基督徒”里根大选获胜得益于“道德多数派”等组织

的鼎力支持。入主白宫后,里根在堕胎、公立学校祈祷等问题上的立场非常明确,随后,基督教右翼推动里根政府取消了1962年禁止公立学校开展宗教活动的立法。^[13]同时,一些新保守派得到重用。其中,柯克帕特里克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理查德·珀尔担任负责国际安全政策的助理国防部长,他被认为是里根政府武器控制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其他还有国防副部长伊克雷、助理国务卿艾布拉姆斯等人。在他们推动下出台的“里根主义”声称:“我们的使命是培植和保护自由民主……支持自由斗士就是自卫。”正如珀尔所说:“没有新保守主义,就没有里根主义”。^[15]里根时期美国在全球争霸中取得对苏战略优势,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初露锋芒。

老布什执政后(1988~1992年)推行不强调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政策,新保守派渐不得志;1992年民主党人克林顿当选总统后,强调多边主义外交,新保守派一度低落。1994年,威廉·克里斯托尔(欧文·克里斯托尔之子)创办《旗帜周刊》,吹响新保守派反击的号角。此后,新保守派的影响很快泛及《外交事务》、《华盛顿季刊》和《福布斯》等权威刊物。新保守派在新闻界、教育界、学术界不断扩大阵地,积聚力量,终于东山再起。基督教右翼也遭遇了一时的瓶颈:1988年,原灵恩派牧师帕特·罗伯逊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失败,加之福音布道家丑闻的曝光,基督教右翼的声誉受到不小打击。而此前“道德多数派”的解体更暴露出问题所在:激进而直白的宗教性语言得不到美国主流政治文化的认可。进入20世纪90年代,基督教右翼组织在不改变初衷的前提下,以一种更世俗、更成熟的姿态重振声势。其中,以帕特·罗伯逊创立的“基督教联盟”最为成功,该组织的“草根动员”政策为其掌握社会资源提供了可靠保证。到90年代中期,“基督教联盟”在美国50个州已拥有900个分部,1994年国会中期选举,该组织完全控制了18个州的竞选,并在另外13个州占据主导,帮助共和党夺回了多年未曾一并控制的参众两院多数席位,^[16]并使这种优势一直保持至2006年11月中期选举之前。美国的政治光谱持续右移。

2000年,福音派信徒小布什(后简称“布什”)入主白宫。虽然大选中布什与戈尔所得选票持平,但在基督教右翼选民中,布什以84%比16%胜出。^[17]2004年,来自宗教保守派的选票同样是布什连任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囊括了“基督教联盟”前主席拉夫·里德、福音传教士葛福林和新保守派旗手威廉·克里斯托尔等人的竞选班子可谓居功至伟。在其指导下,布什阵营推出了一张名为“白宫的信心”的光盘,其中不但叙述了布什被福音布道家葛培理(葛福林之父)传福音所感召的经历,还出现了布什与美国国旗、耶稣像并置的画面。^[17]难怪布什上任后,美国著名评论家法兰克·瑞奇直言:“一个基督教的神权王国诞生了”。^[18]

布什对新保守主义青睐有加,其两任政策班子中新保守派占据多数,其中有: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珀尔、国防副部长沃尔福维茨(现世界银行行长)、副国务卿博尔顿(现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等人;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因伊战困境,新近辞职)虽不属于新保守阵营,却支持他们的主张。仅以沃尔福维茨而言,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导弹防御计划、“邪恶轴心论”等举措就无不与他有关。^[19]同时,政府外围的新保守派还控制了“美国新世纪计划”、“美国企业研究所”等重要思想库。威廉·克里斯托尔创建的“美国新世纪计划”(PNAC)作用最为突出,包括对“布什主义”的成功界定。据PNAC分析,“布什主义”有三个基本要素:发挥积极的全球领导作用,谋求“无赖国家”的政权变更,在世界各国推进自由、民主和人权。布什政府全盘采纳了“布什主义”,并在2002年9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其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新保守派对美国外交的影响达到全盛状态。^[20]

从里根到布什,逐步世俗化的基督教右翼实现了从社会领域向政治舞台的扩张,成为共和党选民的主体和美国社会势力最强大的选民集团;而新保守派则从最初的“影响”决策到“制定”政策,逐步实现了对共和党的主导,成为美国政治舞台的最强音。基督教右翼与新保守派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假如没有基督教右翼选民将新保守派推上政治中心,新保

守主义或许还停留在社论之中;假如没有新保守派将基督教右翼的主张体现于政策层面,基督教右翼的价值观也许仍流于教会的祈祷。两者的结盟打造出两者共同支配美国内政外交的“神权帝国主义”趋势。

三、基督教右翼与新保守派联盟 主导下的美国中东战略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外交事务对美国内政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逐渐成为美国国内政治动员和结盟的动因。新保守派认为促进民主事业是使美国占据道义高地和促进美国利益最有效的外交政策,基督教右翼所热衷的“在世间传播福音”为这种“民主输出”政策提供了神圣诠释;新保守派强调“美国治下的和平”,基督教右翼则坚信“美国特殊论”和基督教救世主义,两者在本质上如出一辙。这种外交理念上的同质性为两者结盟的深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根基。在一些基本的外交立场上,尤其是关乎中东问题的立场,基督教右翼与新保守派存在着惊人的趋同。

(一) 外交立场的契合

对“单边主义”的一致信奉。基督教右翼信奉单边主义,主张加强美国军事力量;与此同时,他们对几乎所有的国际性机构、条约和组织,均持怀疑态度。这与其遵奉的“时代主义千禧年前论”强调依靠个人而非机构和其坚信美利坚民族神圣使命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他们同样担心一个多边主义的世界秩序将损害美国的主权、安全和经济利益。^{[7] (P109)} 在新保守派看来,美国要坚持“承认单极化所必须的单边主义政策”。^[21] 他们认为单边主义能够保持美国的行动自由,能够有效、及时地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避免多边主义可能带来的束缚和低效。布什政府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拒绝《京都议定书》都是单边主义的体现,而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在国际舆论反对声中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更是单边主义的最好说明。新保守派与基督教右翼对单边主义的信奉,可谓殊途同归。

亲以色列的相通情结。几乎所有的基督教右翼组织都高度支持和偏袒以色列。福韦尔曾公然宣称:“谁反对以色列,就是反对上帝”。^{[22] (P107)} 首先,依照“时代主义千禧年前论”,耶路撒冷圣殿的重建,是基督复临建立其千年统治的先决条件。^{[22] (P107)} 其次,基督教右翼以其“选民观”为依据,相信强大的美利坚民族是上帝的选民;而犹太人在当代的成功是犹太民族作为上帝选民的当代证明。因此,作为先后被上帝拣选的两个“特选民族”,美国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维护以色列权益是“履行天职”。与基督教右翼相比,新保守派对以色列的亲近要更为直接而强烈。基于犹太民族特殊的历史经历,以色列被他们视为情感寄托和实现双重忠诚的精神家园。不仅许多新保守派拥有美以双重国籍,而且珀尔、波多雷兹、沃尔福维茨、费斯等人本身就是以色列右翼政党利库德的成员。另外,“美国新世纪计划”、“美国企业研究所”等新保守派思想库以及布什政府中的一些成员都来自于以色列两大安全研究机构:犹太人国家安全研究所和安全政策中心。^[5]

早在1996年由珀尔、费斯等人主持制定的《清晰的决裂:地区安全新战略》就鲜明地表达了新保守派和基督教右翼的共同立场:反对工党政府的和谈路线,主张以实力求和平而不是以土地换和平;建议与亲美的土耳其和约旦紧密合作,架空、排斥阿拉法特,压制叙利亚,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推翻萨达姆政权等。^[5] 事实证明,内塔尼亚胡和沙龙政府基本遵循了这些政策,而布什政府的中东战略与《清晰的决裂》之间更存在着清晰的连续性。

对伊斯兰教的共同敌视。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上千年的流血冲突、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格格不入的价值观、伊斯兰极端势力和部分伊斯兰国家对美国的敌视,以及基督教救世主义的傲慢思维方式,都对美国宗教右翼产生了深刻影响。为布什就职典礼作祈祷的福音传教士葛福林,在“9·11”后公开谴责伊斯兰教是“邪恶的”宗教;2002年8月他又在电视节目中称:“《古兰经》宣扬暴力,全世界‘主流’穆斯林支持恐怖主义”。^[5] 葛福林的抨击代表了基督

教右翼对伊斯兰教的普遍敌意。新保守派更倾向于从民主与专制的角度看待伊斯兰教,他们认为对和平的最大威胁总是来自于反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家。伊斯兰国家的暴政被视为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伊斯兰教信奉真主的主宰而排斥世俗的主权,与民主互不相容。^{[14] (P27)} 民主国家应该挺身反对暴政。

至此可以看出,基督教右翼浓重的亲以属性和反伊斯兰意识契合了新保守派出自犹太鹰派本能的民族和宗教倾向,基督教右翼偏执的宗教观念和价值取向不仅为新保守派的外交政策提供伦理依据,而且使之在神圣光环下更具进攻性、坚定性和妄想性。这种近乎天然联盟的形成和加固,也正是基督教右翼神学思想不断深入和内化新保守派外交理念的过程。布什任内的中东战略,便是这种过程的典型体现。

(二) 体现基督教右翼思想的新保守派中东战略

反恐战争与“倒萨”。“9·11”事件后,恐怖主义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美国本土安全问题与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同时凸现出来,加大反恐力度得到了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支持或默认。这对于新保守派而言,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

国难发生后,布什多次发表讲话,在严厉谴责恐怖主义的同时,他将美国等同为正义和上帝的化身,声称“我们对历史的责任十分明确,那就是回应攻击,消除邪恶世界。上帝在这场自由与恐惧、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不会保持中立”。^[23] 圣经《马太福音》中的“要么跟我站在一起,要么反对我”遂成为这位总统乃至美国政要反复引用的神圣“语录”。而基督教右翼领袖在公开场合毫不避讳的煽动性语言更是迎合了民众的愤怒和报复心理,就连五角大楼情报高官威廉·波亦金少将都说:“好在有布什,他领导上帝的军队,对抗那个叫作撒旦的偶像”。^[24]

2001年10月,新保守派主导下的布什政府正式启动旨在铲除“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政权的阿富汗战争并口是心非地宣称“反恐战争”不是针对伊斯兰世界,而是为了让和平的生活方式“免于恐惧”。^{[25] (P9)}

然而,美国在阿富汗初步得手后,立即迈出了反恐扩大化的步伐。2002年1月,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抛出了令全世界惊愕的“邪恶轴心论”,伊拉克与伊朗赫然“上榜”。咨文提出“美国可以利用‘先发制人’的战争行动来应对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美国有权利和义务摧毁‘邪恶国家’……”。^{[25] (P9)}

2003年3月,布什政府以所谓“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悍然发起摧毁萨达姆政权的伊拉克战争。从常识判断,伊拉克战争背后应有觊觎石油资源的因素,但新保守派更强调:“罢黜萨达姆政权是使中东的权力平衡向有利于以色列一方倾斜的关键”。^[5] 基督教右翼则将盘踞在“巴比伦”(《圣经》中伊拉克古称)的萨达姆视为“反基督”的化身,他们甚至坚信“当巴比伦最终被摧毁,耶路撒冷就迎来了持久的安宁与和平”。然而,就美国新战略的整体而言,“倒萨”的首要目的,是为“民主重塑”中东和彻底铲除恐怖主义打开突破口。新保守派专栏作家克劳塞默写道,“‘9·11’后美国别无选择,只有担起重建阿拉伯世界的责任,而伊拉克正是这个‘历史性试验’的开始”。^[26] 沃尔福维茨也表示,“伊拉克解放后,杰斐逊式的民主在中东将像雨后春笋一样”。^{[27] (P61)} 显然,“民主赤字”的伊斯兰国家已被美国视为滋生恐怖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反美主义的温床,而以战争铲除暴政、培植民主,不仅为道义所允许,而且为道义和利益所必须。

“大中东计划”。伊战之后反美情绪和反美恐怖活动的蔓延,使得新保守派越发意识到,不能指望伊斯兰国家自行发展民主。美国使用军事手段的目的,原本就是要对“邪恶国家”乃至伊斯兰世界进行文明改造。2004年6月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布什政府正式提出“大中东计划”。“大中东”还涵盖了阿拉伯联盟22个成员国和以色列、巴基斯坦、阿富汗、土耳其这4个非阿拉伯国家。该计划主要内容为:推翻独裁暴政,建立民主政治;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取代国家垄断和伊斯兰半封建经济;推广西方式世俗教育,培养有文化的新一代;改善妇女地位,建立男女平等的公民社会。^{[28] (P34)} 该计划旨在用现代西方标准全方位变革伊斯兰世界。

作为“大中东计划”的主要策动者，新保守派可谓用心良苦。首先，推翻中东的反美（反以）政权，不但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和独霸中东的战略蓝图，还能彻底改变对以色列不利的地缘政治环境，使巴勒斯坦一方陷入孤立，在最大限度满足以色列的前提下解决中东问题。其次，如果中东完全实行市场经济，不但可为美国的石油权益提供更可靠的保障，还能让以色列背靠一个广阔市场而无须舍近求远。^{[29] (P35)} 但该计划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企图在整个中东传播福音派基督教民主”，^[24] 进行谋划已久的“文明置换”。^{[29] (P23-78)} 这种文明置换战略出自一种对伊斯兰文明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敌视，即认为专制暴政、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皆源于伊斯兰教反对西方世俗民主的固有属性，所以西方文明必须以征服对其异质性加以遏制。无论是布什“口误”说出的“十字军东征”，还是福韦尔电视访谈中“失口”将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称作“名副其实的恐怖主义者”^{[30] (P25)} 都是这种刻骨敌意的体现。这种文明置换战略的核心是对伊斯兰国家政权实施强制的民主改造。同时，这也是偏执笃信“基督教是唯一真宗教”并以此作为神圣依据的意识形态扩张，是将美国的基督教文明模式等同于普世文明标准，^{[29] (P23-78)} 通过在伊斯兰世界全面推广美国价值体系来改变其文明属性，使之实现同发达资本主义文明的同质化。如果对大中东的文明改造获得具有示范意义的真正进展，那么当然会对构建美利坚新型世界帝国产生重大推动作用。

然而，这种战略却只能说明其制定者和支持者的政治野心、宗教狂妄和冥顽无知。文明间的征服性同化即使在殖民主义时代也鲜有成功范例，更遑论东方各大文明竞相走向复兴的全球化时代。“大中东计划”实际正在流产，定将以失败告终。伊斯兰文明的生命力远未枯竭，其自身终会找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外力强加的“改造”、“置换”只会适得其反，并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竭力打造和支撑的先天畸形“民主”，既不能真正代表民意，也没有带来“美国治下的和平”，却激起反美、反傀儡政府的恐怖袭击持续增长，教派争

权流血冲突日益加剧，局面渐成失控之势。

新保守派大概永远不会承认，美国对以色列的过分偏袒、对伊拉克的霸道入侵、对中东石油的贪婪和对伊斯兰文明的敌视，才是中东反美主义滋生和蔓延的主要酵母。尚未从伊、阿不对称战争困境中脱身的新保守派，又执迷不悟地将矛头提前指向了最难对付的什叶派伊斯兰教地区大国——伊朗，在核问题上对其大动干戈，而真正目的是要推翻这个 27 年来一贯反美反犹的头号神权国家。“倒萨”后不久威廉·克里斯托尔就胸有成竹地声言：“伊朗是防扩散战争、反恐战争和重塑中东努力的焦点……下一场伟大战役是对伊朗”。^{[31] (P9)}

然而，如今美军深陷伊拉克且死伤日重，国内反对布什政府伊战政策者已成民意主流，美国实难再对“邪恶国家”新启战端，而且不得从单边主义向多边主义过渡。但是转变来得太晚，“潘多拉盒子”已经打开。一年来，中东伊斯兰激进势力在伊拉克、阿富汗、伊朗、黎巴嫩以及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等五条战线上对美、以强权展开有力反击，双方对抗已进入对侵占者不利的胶着状态。而“基地”头目仍在摇旗呐喊，鼓动圣战。不仅如此，自伊战以来规模性恐怖袭击还在与美国或西方人关系密切的西欧、西亚、北非、东南亚不少国家多点开花。正如 2006 年 9 月美国情报界自伊战以来的第一份反恐形势正式评估报告所承认，伊战不但没有削弱中东宗教激进势力，反而促使新一代恐怖分子成长并向世界各地扩散，美国面临的恐怖威胁比以往更加严重。与伊战困境密切相关，共和党在 11 月的美国中期选举中全线溃败。

可以说，新保守主义和基督教右翼势力退潮的时期已经到来。但是美国面临的重大难题依旧：无论两党内外如何激烈争吵，却无人能够提出美国安全脱身伊拉克和应对中东形势整体恶化的良策。从美国霸权主义与伊斯兰激进力量的对抗本质和对抗态势判断，这场业已激化和扩大的“文明的冲突”在近期是无法偃旗息鼓的，对美国来说，其前景暗淡而艰难，无论进退都充满危险。

四、结语

政治民主化如同经济市场化、社会世俗化一样,都是当代人类社会进步的大势所趋。民主政治的实现,应取决于自身社会的现代化成长和民众普遍的政治改革诉求,不能通过外力强加。然而,白宫内外偏执的新保守派们,在身后基督教右翼信众的支持之下,却将“实现民主”变成了强权政治和黩武主义的最大目标。现今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已由安全、军事层面扩展深入到文明、文化层面。没有人会

否认这场国际冲突背后的利益因素,但如果决策者执意把利益因素转化、上升为某种宗教或神圣诉求,矛盾就会变得更加尖锐和无法调和,冲突必将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新正统派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曾经说过,“无论在何处,一旦宗教与权力结合,一旦信教之人获得权力,他便处于那种声称自己所必须采取的(通常是有罪的)行动得到了上帝恩准的危险之中”。^{[32] (P 121)} 尼布尔 70 余年前的这番话,无论对布什政府还是新保守派而言,都是一个真正的告诫。

[参考文献]

- [1] [美] R·G·哈切森. 白宫中的上帝[M]. 段琦, 晓镛.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 [2] 王联合. 论美国新保守主义及其外交影响[J]. 现代国际关系, 2003(4).
- [3] Irving Kristol. Neo-Conservatism: the Autobiography of an idea—Selected Essays 1949—1995[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5
- [4] 刘军宁. 保守主义[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 [5] William Schneider. Israel's U. S. Defense Team [EB/OL]. http://www.aei.org/publications/pubID/13842/filter/all/pub_detail.asp 2002-04-27.
- [6] [美] 塞缪尔·P·亨廷顿. 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 程克雄.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5
- [7] Robert Booth Fowler, Allen D. Herzke, Laura R. Olson.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Faith, Culture & Strategic Choices[M].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9
- [8] [美] 肯尼思·D·沃尔德. 宗教团体对中美关系进展的影响[J]. 段琦. 世界宗教研究, 1999(1).
- [9] 刘澎. 当代美国宗教[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 [10] 葛丽英. 基督教新右派运动兴起的主要动因[J]. 宗教学研究, 2000(4).
- [11] 孙逊. 新保守主义思潮对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J]. 现代国际关系, 1999(5).
- [12] Robert W. Fogel. 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 and the Political Realignment of the 1990s [EB/OL]. http://www.aei.org/publications/pubID/18982/filter/all/pub_detail.asp 2000-01-01.
- [13] 冯春风. 美国宗教与政治关系现状[J]. 世界宗教研究, 2000(3).
- [14] 董小川. 20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15] 潘同文. 美国新保守主义对里根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J]. 国际问题研究, 1986(4).
- [16] 顾岳. 宗教与美国全国性选举[A]. 宗教与美国社会(第一辑)[C].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4
- [17] Kevin Eckstrom. Election Shaped by Moral Values [EB/OL]. <http://deseretnews.com/dn/view?i=438259510288300.html> 2005-03-22
- [18] John Green, Steven W. Aakman. The Twelve Tribes of American Politics: The religious groups that comprise the U. S. electorate [EB/OL]. http://www.beliefnet.com/story/155/story/_15503_1.html 2004-07-03
- [19] 刘恩东. 沃尔福维茨其人[J]. 国际资料信息, 2002(6).
- [20] 郝雨凡. “9·11”事件与美国保守主义[M]. 美国研究, 2002(2).
- [21] 吴非. 美国单极化破坏媒体发展 [EB/OL]. <http://www.cddc.net/shownews.asp?newsid=7317> 2005-11-03
- [22] 徐以骅. 宗教新右翼与美国外交政策[A]. 宗教与美

- 国社会(第一辑)[J].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
- [23] Kristin Henderson. In the Hands of God [EB/OL].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6/04/25/AR2006042501608.html 2005-10-01
- [24] Michael J. Kelly. The Bush Foreign Policy 2001-2003: Unilateralist Theory in a Multilateral World and the Opportunity for Change Offered by Iraq [EB/OL].
http://www.wustl.edu/Publications/WUGSLR/IssueArchive/Volume_2_1/Kelly_book_pages.pdf 2005-05-22
- [25] 朱锋. 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及其近期反恐怖政策[J]. 和平与发展, 2001(4).
- [26] 栾豪. 一场新保守主义推销的战争[N]. 新民晚报, 2003-03-05(7).
- [27] 陈超. 新保守主义与美国全球民主化战略[J]. 教学与研究, 2003(9).
- [28] 高祖贵. 美国与主要伊斯兰国家的关系: 重塑与改造[J]. 国际资料信息, 2004(11).
- [29] [美] 保罗·尼特. 宗教对话模式[M]. 王志成.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30] 朱世达. “9·11”事件后美国的文化悖论[J]. 美国研究, 2004(2).
- [31] William Kristol.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The War on Terror Continues [N]. Weekly Standard, 2003-05-12
- [32] Reinhold Niebuhr. Beyond Tragedy: Essays on the Christian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M]. New York: Scribner's, 1931.

(责任编辑 齐琳)

· 学术信息 ·

“人权原则”对国际关系准则的挑战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杨闯教授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年第11期发表的《“人权原则”和“民主原则”对国际关系准则的挑战》一文中指出: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将“人权原则”、“民主原则”等国内政治原则运用在国际关系中,严重挑战国家主权原则、主权平等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美国等国以“人权原则”为理论盾牌进行的“人道主义干预”,造成了新的人道主义灾难,其以自己的“民主模式”改造他国的行为,则是与国际关系民主化背道而驰的。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各国的相互依存加深,同时实力原则和强权政治仍在起作用。应认清国家主权原则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所面临的挑战,以避免“人权原则”和“民主原则”成为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国家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

(王旁)